



严家炎,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原江苏省宝山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曾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严家炎先生一辈子与学问打交道,他也一直相信,学问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不但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有益人生,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表现。中国传统文人多将“立德”置于“立言”之先,为学做人都当需一点“傻子”精神,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耐得住寂寞,还要勇于承担。严家炎先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校长舒同写给学生的告诫:“工作向上看齐,生活向下看齐。”70岁那年,严家炎告别了大学讲台,却仍一直在学问和人生路上继续坚守信念。正如他所钟爱的那个姚雪垠留下的诗句:“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这位痴情者还在为文学事业冷思热考,热情勉励。

#### 文才初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第九集团军军长张治中率部与日军在长江口激烈交火。住在宝山县的农民严锺毅夫妇带着少量衣物、炊具和4岁的儿子逃难,数月后返回。他的父亲严伯勋曾是清末秀才,其时年岁已高,就留在杨行镇严家巷村的老宅里。适逢乱世,四处横行的除了日本兵,还有一些趁机浑水摸鱼的土匪盗贼。一年后严伯勋不幸在与盗贼搏斗过程中遇害。严锺毅也因为长期胃溃疡导致胃穿孔,在1946年去世了。

尽管乱世生活艰苦,但幸而家境还算殷实,那个坐在篮子里跟着父母一同逃难的孩子严家炎还是健康地长大了。从两岁起,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到4岁时,他已经能认得上千个汉字。回到严家巷后的第一个冬天,父亲请私塾老师给村里的孩子们教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但严家炎可以直接从《孟子》读起,读完《孟子》又学了半部《论语》,继而是《史记》。上过两年私塾后,严家炎到二里外的大庙小学接触了“新式教育”。因为基础较好,他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如很多现代文学家一样,童年的严家炎偷偷地读起了在传统观念看来是不务正业的小说,这些书家里是不缺的,祖父和父亲留下什么他就读什么。“甚至在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偷着看小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杨家将》,第二部是线装的《三国演义》,初中以后我的阅读面就宽了,冰心、鲁迅和巴金的书我都开始涉猎。那时候能接触到的西方小说不多,直到初三才看了一些。”从那以后,严家炎就成了一个痴迷文学的人。高二时,因为在《淞声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他更是坚定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为了圆文学梦,他甚至违背家里的意愿,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就读正规大学,而是走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所大学最需要”,半年结业后做了土改干部,经历了6年劳动锻炼的艰苦生活。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严家炎便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于同年9月报考北京大学,次年2月入学,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即硕士研究生),从创作转向研究之路。

#### (上接第1版《文学理论批评:在新时代获得新的活力》)

在范玉刚看来,40年来在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同频共振中,正是理论的变动主轴牵动着文艺批评的神经而呈现出斑斓色彩,生成诸多独特艺术的中国文艺现象。面对当下的文艺现实,要建构起新时代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这一建构更重要的是要契合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唯如此,才能有效传播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展示中国伟大复兴的形象,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声响和色彩。

#### 守正创新,为文学史“放下第一块砖”

周由强表示,真正的理论批评只有守正创新,才能大有可为。守正创新,“正”特别重要,“正”是基础和前提,是文艺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新的突破。要加强文艺基础理论研究,打磨好基础性的问题。批评家要大力推荐精品,用作品说话,引领时代风气。要改进文学理论批评文风,讲真话讲实话最能够感染人。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要有思想,思想具有无限的力量,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张莉看来,重建文学批评的信任在今天非常重要,现场批评实际上难度很高,批评家要对作品给出文学史维度上的考量和判断。文学批评家就是一种尺度、一种标准,是在文学史上放下“第一块砖”的人。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导向,实际上批评家就是在建构文学史。如今各类文学榜单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纯文学的雅正的标准,这个标准首先要对今天的批评和创作有引导意义,另外也要对整个文学史负责。每一段文学史都不是自然形成的,是每个阶段文学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木叶在和一些作家交流时发现,他们比较反感批评家用西方理论嵌套作品,将作品以拼贴方式纳入到某种轨迹进行阐释。因而自己也在反思,文学批评如何展示自己的文体和样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古典还是现代,我一直努力尝试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元素融入文本之中,让它成为独立的可运用的资源,具有自己的文本属性和主体性,而不是生硬的教条准则。”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本身就是美的创造,其中蕴含的思想独特性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品质。

# 鲁阳时晚戈犹奋

—专访严家炎 □本报记者 丛子钰

现代一概废除,只要它的思想是现代的,当然可以在现代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现代文学史在晚清的开端,相较于王德威所认可的戊戌变法前后,严家炎认为应该提早到10年前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里提到“言文一致”、肯定“俗语”观念出现之时。他说:“它就是我们20世纪文学史的发端。那里面提出要让广大的国民群众——‘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都有文化,文学也应该让国民都能读,这是在1887年。”这时刚好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申报》诞生不久,现代传媒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通向大众的通道。对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出版方式和现代传媒都是重要因素。

同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意味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是学造船专业出身的陈季同,他一开始读的就是西学,读书期间学习了8年法语,法语老师要求学生们读法语小说和其他法国文学作品。陈季同在法国居住了16年,身份是驻法大使馆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工作。陈季同用法文写过7本书,介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这些书近年终于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形成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陈季同既反抗西方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他提醒中国同行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提倡大规模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之后,大约在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上半年之间,严家炎发表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现代文学”是“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这一观点。

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他认为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工作不无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新中国以来该学术领域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籍可供参考借鉴,又要求鲜明的原创性,必须贯穿作者的发现和识见。书中论述的八个流派都包含着作者的心血,其中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都是由他命名的,新感觉派在被埋没几十年后,也被严家炎重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他并不赞成把研究称作“划分流派”,因为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客观存在,不是人为地主观规划出来的,更不应该给作家排座次。严家炎希望这部小说流派史能表现出不同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示出错综复杂的立体关系,他一直坚守着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来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最初严家炎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力来自于60年代后期编教材时的思考,在1962年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上,吴组缃先生发言时说:“刘呐鸥写的小说我读不懂。”这引起了严家炎的注意,不久后,他从唐弢那里借来《都市风景线》来读,才体会到它真的有些特别,于是有了兴趣对刘呐鸥周围的几位作家进行研究,写就了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论文。在他看来,新感觉派小说的主要特点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对小说形式技巧花样翻新,建立了一种开掘潜意识、隐意识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个流派尽管在倾向上有一些问题,但仍不失为第一个真正从小说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的独立流派。

正如严家炎所说,他的研究始终是从疑点入手开始进行,实际上他对“文学现代化”的判断也是在对一系列现代作家的重读与批评中产生的。这个问题源自于对鲁迅的重读,他认为“文学现代化”概念是从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40年

代的朱自清和冯雪峰那里提出来的,而自己只是重新捡起来加以运用而已。除了论述鲁迅小说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也鲜明地提出了严家炎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在写完为萧军平反的文章后,严家炎开始研究丁玲作品。他在读《在医院中》时,连续读了三遍,每次都被主人公陆萍的改革精神所感动。严家炎认为,《在医院中》正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揭露小生产思想习气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的。丁玲在延安要把五四启蒙精神引向解放区应该是她的功劳而不是罪过。严家炎评价她是“充分地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用心灵去创作,有独特的思想锋芒,有充沛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家”。

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2001年《复旦大学报》开辟的专栏仍然引起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关注。从21世纪向20世纪回首望去,文学史分期首先要从文学自身的实际出发,而不是通过简单地根据政治事件进行划分。比如现代文学只能从“文学革命”算起,而不是民国;当代文学也不应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分水岭。从1919年起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内部一以贯之的规律,为了避免过于含混、不确切,严家炎主张还是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为好。而对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是否已经“逐渐与五四文学新传统产生距离”,他持保留意见,因为五四新文学和90年代文学都相当复杂,不宜过于简化。

如今20世纪已成历史,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21世纪正在到来,严家炎对全球化时代给予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有忧虑,但不悲观,他相信全球化可以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首先电脑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方便学者们查找资料,学术上封闭、垄断的情况也可能进一步得以打破。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我们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遗留的某些偏狭观念,让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和突破。此外,全球化时代也将促使我们更好地确立大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宽广视角,改变旧有的中国文学资源只存在于中国本土的观念,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意识。当然,全球化时代也对文学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严家炎认为,信息公开化不等于个人隐私可以毫无顾忌地公之于众,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否定共同价值标准。“全球化进程不仅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赋予我们重要使命,那就是努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纯洁。”

#### 没有五四,何来金庸

大陆最早对金庸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冯其庸,80年代中期他就在《中国》上提到了金庸的小说。1991年,严家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期间大量阅读了金庸的作品。因为自幼接受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严家炎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十分有趣。也可以说,他后来从事金庸研究与他要求将现代文学的含义扩大到“现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应当包含通俗文学在内的观念与之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严家炎在通俗文学商业化的问题上有所保留。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首先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其次用通俗的文类、通俗的形象写出了现代的精神,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比如在形象上,金庸的《笑傲江湖》用了很多象征手法,有几个典型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深刻地塑造了华山派岳不群这样一个伪君子的形象,他的内涵比左冷禅还要丰富很多。而到了《鹿鼎记》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有点浮世绘的味道。韦小宝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带有反英雄的色彩。金庸真正要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渗透了对历史、社会的观察。他自己曾说:“武侠小说本身

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严家炎说到:“就连《书剑恩仇录》这部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处女作也有一些不平凡的思想闪光。乾隆的皇帝地位,他的种种利害关系,都决定了陈家洛的天真幻想最终只能是个悲剧。金庸不是阶级论者,但他对历史的了解和深刻观察,使他相当成功地写出了陈家洛的悲剧。”因此,读他的小说,除了能够得到消遣之外,也能得到思想的启发,感受到正义与邪恶、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较量。但他又避免了抽象地讨论武林人物的正邪,避免空洞地讨论人性的善恶。金庸重视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他相信“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设计情节,所以他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又自然合理。

新旧武侠小说的区别在于观念,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恶如仇、杀身成仁、舍己为人等观念。而金庸作品则对此进行了革新。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还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的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金庸又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他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思想,强调侠士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金庸是在小说中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中华各民族关系的第一人,他小说中的一号英雄乔峰是契丹人,一号美女喀丝丽是回族人,一号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这些看似巧合,其实偶然之中透露出必然。

除了更新武侠小说的精神意旨,金庸也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中期以后,他的小说由重视侠义精神向重视象征寓意转化。传统武侠小说一般是浪漫主义的,像鲁迅用表现主义方法去写《铸剑》是很重大的发展。金庸从《神雕侠侣》开始,就在小说中增添了不少象征寓意的成分。绝情谷里的情花就是一例,它象征着多样、甜蜜又带刺的爱情,它既寓含了杨过和小龙女的终身相守,也包含了绝情谷主与妻子裘千尺的相互加害,李莫愁和陆展元的残忍和痴情。在严家炎看来,最能表现金庸小说象征意味的作品当属《笑傲江湖》,小说通过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的较量,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它表面上看是一部武侠小说,其实又是一部长篇的政治寓言。故事没有点明发生在什么朝代,恰恰更增强了他所概括的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感觉,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上,似乎只有卡夫卡作品方可比拟。”

在语言使用上,严家炎不同意王朔的说法,他觉得这不能说是一种“死去的语言”,金庸写的是古代,他的小说一方面使用的是新文学白话文,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语言的长处,此外近代翻译小说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金庸从小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类古典小说,也喜欢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西方小说,他还喜欢读‘五四’新文学家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这些作品都成为他广泛吸收的艺术营养和宝贵资源。在金庸笔下,没有了侠客们腾云驾雾或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描写,他的武侠小说大大地被生活化了。”读金庸小说,读者常常会联想到《庄子》那样瑰丽恣肆的想象力,也会被其中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所感染。因为古典小说的影响,金庸很注重节奏的调整与变化,一场紧张厮杀之后,随机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这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艺术节奏给读者带来很大的艺术享受。

## 专家学者研讨 浙东唐诗之路的当代价值

本报讯 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主办,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唐诗研究所承办的“唐诗之路与绍兴文化产业开发”高峰论坛日前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全国40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绍兴唐诗之路的历史与当代价值”“唐代诗人、文献、作品在绍兴的关系与传承”“唐诗之路与绍兴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保护和利用”等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为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提出了建议。(绍闻)

## 清新文化研讨会 暨书画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11月10日,“清新世界”第十五届清新文化研讨会在京举行,有关方面领导和文化艺术界、传媒界人士近百人与会。此次活动以“传播清新思想,构筑清新世界”为主题,旨在通过学术研讨、书画展、书画笔会等多种形式,弘扬清新风气,提升清新格调,展示当代优秀书画家、艺术家对清新风格的追求及其艺术成就。与会者表示,清新思想立意高远,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后要努力创作出更多相关文艺作品,为推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欣闻)

#### (上接第1版《我的文学随想》)

当然,回首四十年的文学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热浪滚滚,有时相对平静;或者时而受抬举,时而被冷落;或者在这个地区受到重视,换个地区却遭到忽略。文学的荣光与尴尬,外部原因固然复杂纷纭,但如果从作家自身反省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内心的平衡。四十年的文坛,实际上让作家经历一场考试,也给予作家一个平台,表演聪明与才华,展示格调和气质,体现心地及品德。而这个表演、展示、体现的过程,必然有高下之分,有雅俗之分,有上帝点头和发笑之分,有读者喜欢和厌恶之分。我的意思是,文学的进步,除了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更关键的,还取决于文坛从业者们的自身状态。

事实上,四十年来,怀抱着各种理想的人们,跻身于叫人惊喜交加的文坛,多数出于内心表达的冲动,有的为了获得职业的尊崇,有的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文学马拉松跑到后来,有的半途退场,有的坚持至今。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退场仍然令人尊敬,有的坚持则属于勉为其难。

文学通常表现为有众多读者的参与。但写作自身,一定应归类为独自做事。你如果追逐热闹,哪儿人多奔哪儿去,个体劳动就必然变成呼朋引类。比如,拿深入生活来说,采用前呼后拥的方式、浮光掠影的方式,就往往造成你的身子到了边远的城市、偏僻的乡镇,你的感觉可能还留在你的长居之地。你看到的、听到的,都会是同一模板里出来的百城一面、千镇一貌,都会是除套路之外,当代人共有的急功近利,同样焦虑的房子、车子、票子。而轻而易举地,就会忽略掉各个地方依然具有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以自身的体会想说,一些错觉的产生,可能恰恰正因同行者太多,人多嘴杂制造了并不需要的热闹。试试让自己少去些喧嚣场合,安静下来,就可能写好琐碎的家常日子,写好曲折的精神历程,写好多元的“自我”审美。如此省

悟之后,那些熟悉的人、陌生的人、贫贱的人、富有的人,如何一天天走来,如何一年年变化,就可能在你的笔下,呈现出真实的丰富与新奇。

三四十年前,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自己的书房。但不分时间、地点的阅读,使人们尽情领略到书中的大千世界。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提倡读书、组织读书的活动如雨后春笋。但事实上,读书已变得日益奢侈,甚至仅仅成为一种让人观赏的“项目”。如果没有坐拥书城的架势,没有咖啡、没有茶,没有绿色植物、没有工艺摆件,没有背景音乐,读书似乎很难进行下去了。在国营书店日趋萎缩的状况下,不少民营书店已经沙龙化。将一本书一行一行地读进眼睛里,一页一页地读进脑子里,已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这是文学碰到的新问题。我一个朋友曾说过:“你只有读,你才会写;你只有写,你才会读。”可见,阅读是文学的前提,也是文学的基础。提倡行之有效的阅读,应是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回想自己四十年的文学岁月,我从来都只是想做一个尽可能称职的文学劳动者,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我不关心论争,论争常常耗费时间。不理睬闲言碎语,因我没有应对的能力。种种不良情绪,反倒使自己产生一种宁静的生活满足。也因此有心情、有闲暇,让思路飞翔,去关注古代的人与事,去亲近现代的人与事,去体察国外的人与事,去拥抱当代的人与事。然后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经由数十家出版机构的帮助,成为八十多种不同封面的图书。再经由无数读者慷慨的购买,转化为我继续写作的动力。数十年文学经历,虽然平淡而乏善可陈,但恰恰是从切身感受出发,对中国文学宽容的四十年,我要送上真心诚意的感谢。我是一个从来就缺乏深度思考的人,但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已经完结的四十年文学实践,必将在在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史册里,留下空前绝后的记载。